

中国现代文学学习 参考资料

一 册

(下)

延边大学朝文专业
中国现代文学教研组编

一九七七年十月

(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04—835页）

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

（见《红旗》1967年第9期）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节录“学习”一节，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8—500页）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72—1379页）

目 录

(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抗战以来的文艺思潮·····	郭沫若 (1)
斥反动文艺·····	郭沫若 (4)
新文艺的使命·····	郭沫若 (10)
暴露与讽刺·····	茅 盾 (18)
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	艾思奇 (19)
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	艾思奇 (28)
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	向林冰 (33)
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 形式”吗? ·····	葛一虹 (37)
中共中央总学委通知·····	(44)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	(45)
关于“再批判”的按语·····	《文汇报》编者 (47)
逼上梁山·····	延安平剧研究院集体创作 (49)
简短的几句话·····	延安平剧研究院 (117)
致全国平剧界书·····	延安平剧研究院 (119)
关于平剧的接受遗产与服务政治问题·····	阿 甲 (120)
文艺创作与主观·····	乔 木 (124)
关于现实主义·····	何其芳 (143)
略论大后方文艺与人民结合的问题·····	何其芳 (158)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肖军问题的决定·····	(164)
东北文艺协会关于肖军及其《文化报》 所犯错误的结论·····	(165)
斥《文化报》的谬论·····	《生活报》社论 (170)

〔附 (三) 录〕

编者的话·····	梁实秋 (175)
“与抗战无关”·····	梁实秋 (176)
一般或特殊·····	沈从文 (178)
从现实学习 (节录) ·····	沈从文 (183)
“文学周刊”编者言·····	沈从文 (192)
本刊启事 (代发刊词) ·····	战国菜 (197)
文学批评的新动向 (节录) ·····	陈 铨 (198)
民族文学运动 (节录) ·····	陈 铨 (205)
文学与人生·····	朱光潜 (212)
自由主义与文艺·····	朱光潜 (218)
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 (节录) ·····	张道藩 (222)
寄语中国艺术人·····	林同济 (230)
政治家、艺术家·····	王实味 (236)
野百合花·····	王实味 (240)
三八节有感·····	丁 玲 (248)
在医院中·····	丁 玲 (252)
论同志之“爱”与“耐”·····	肖 军 (272)
抚今追昔录 (节录) ·····	肖 军 (277)
夏夜抄之三·····	肖 军 (278)
政、教泛谈·····	肖 军 (279)
丑角杂谈·····	黄玄 (肖军) (281)

还是杂文时代·····	罗 烽 (283)
了解作家, 尊重作家·····	艾 青 (285)
写在王实味《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	
之后(节录)·····	陈伯达 (288)
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	陈伯达 (289)
论主观(节录)·····	舒 芜 (294)
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	胡 风 (312)
对于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一理解·····	胡 风 (318)
中国文艺往哪里走? ·····	肖 乾 (326)

抗战以来的文艺思潮

——纪念“文协”成立五周年——

郭沫若

在抗战尚未开始之前曾有人为文艺担忧，以为战争一开始，爱国的作家必然投笔从戎，文艺便会遭遇重大的损失，或者甚而至于停顿。然而在抗战进行已经五年有半的今天，确实地证明了这种想念纯然是杞忧了。抗战以来，文艺不仅没有停止它的活动，反而增加了它的活动；不仅没有降低它的品质，反而提高了它的品质。

抗战初起时，由于战争的强烈刺激，在文艺界曾经激起过一番剧烈的震动，确是事实。多数文艺性的期刊和报章附刊，不是完全停止便缩小了范围；口号式的诗歌，公式化的独幕剧曾盛行一时；小说的地位几乎全被报告速写所代替。其后随着战争的长期化，这种兴奋状态，镇静了下来，文艺的步骤渐恢复了它的常态而且大有进展。虽然有人也在高喊着“文学的贫困”，但仅是不看事实的信口雌黄而已。

国家临到争生死存亡的关头，民族受着了空前未有的浩劫，一切都应该为了前线，所以有“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号召。作家在这种号召之下大多数是动员起来了。虽然在初期也有少数的人倡导“与抗战无关”论，但为大势所迫，不久也就消声匿迹。近来如沈从文先生又有“反对作家从政”的见解，在沈先生或许是一片好意，认为作家应该站在自己岗位上努力，不宜旁骛。这在平时是不会成为什么问题的议论，但在

战时却可大成问题，而且把作家努力参加动员工作认为“从政”，那也不免是超过误解范围的诬蔑。这事是值得从文先生反省的。

为了要动员大众，文艺界曾有“旧瓶装新酒”的主张和尝试，便是利用旧有通俗的形式如弹词、鼓词、民歌、旧剧、章回小说等，以便于一般的接受。这是偏重于宣传与教育的意义，已经产生了不少的作品，并收到了不少的效果，是无可否认的。这一种运动除动员大众之外，使作家于习用现代的新形式之余，回顾了本国的遗产，在无形之间摄取了旧时的优点，而使新旧起了一番综合，在文艺上说来，也不能不认为是较为重大的收获。但有人把这种运动的意义过份夸大，否认五四以来的新文艺的成就，而认为一切文艺应从通俗的文艺再出发，那却是一种有害无益的偏见。为克服这偏见，曾经有长期的关于“民族形式”的检讨，大率已经是得到了它应有的结论了。

文艺的生命是在内容，作家的生命是在生活。大时代使作家的生活改变而充实了，文艺的内容自不得不因而充实。作家须与大众打成一片，向大众的生活学习，从而作生活的反映与批判，作品自能亲近大众而为所接受。既成的形式我们自当作为历史的贡献而宝贵它，然而已经失了时代性的东西决无法恢复其旧有的势力，尊重民族形式并不是复古，那是无容置辩的。

经过五年半的战火的锻炼，使战前的文艺思想更加钢铁化了。例如反帝反封建的主潮变而为抗日=反法西斯的号召，这只是性质的更加明朗化，力量的更加集中化，并没有本质上的什么变更。法西斯主义即是封建帝国思想穿上现代帝国主义的武装。日德意三个轴心国家都是封建思想未能扬弃，而产业近代化了的怪物，它们同走向法西斯主义而成为一个集团，实有

其历史的必然性。而我们战前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潮汇流而为反法西斯运动，也正自有我们的历史的必然性。故尔五年半来的战火只是证实了五四以来的路线的正确，因而也就无法抹煞五四以来光辉的战果。

抗日 = 法西斯，这是民族解放的意识发露，也就是新现实主义的骨干。以此为骨干的中国新文艺在作为其血与肉的资源上有赖于古今中外的题材。任何材料都可以供作者驱使，只要你作者有驱使它的能力，有充分的研究和调查。关于题材问题，一时曾相当狭隘，而且至今也还有人抱着这样的见解，以为必须直接采自抗战的现实，这可以说是画地为狱。但我这样说也并不是赞成了“与抗战无关”论者的意见，“与抗战无关”论者是要作家的精神脱离抗战，或超越抗战，这就是所谓非现实主义。我们却要扩展题材的范围，是把与抗战有关的关系扩大了。我们在同一的主题之下，不仅要写现代的题材，也要写古代的题材，不仅要写中国的题材，也要写外国的题材。现实主义所谓“现实”不是题材上的问题，而是思想认识和创作手法上的问题。尽管是眼前的题材，如以“与抗战无关论”者来写，便成为非现实。尽管是历史上的题材，如以正确的意识形态来写，便成为新现实。这是易明的事理。近来题材的范围确实是扩大了，因而也就是新现实主义活动的范围更加扩大了。

但有一部分的批评家对于这现实与历史的关系似乎不甚了解，每每以为写历史题材便是“逃避现实”或“不敢正视现实”，这正是非现实主义的了解，因为评者本身并未懂得现实主义究竟是什么。现实主义并不是单纯的写实主义，它必须“彰善阐恶，树之风声”，因而它的骨子里面便不免有“刺”，中国的儒家经典中的《诗三百篇》，差不多没有一篇没有“刺”。

“刺”于文艺的存在可以说等于自然属性，就好象世间上没有没刺的蔷薇，没有没刺的蜜蜂。你假如怕“刺”，最好是谨慎些不让自己有被“刺”的弱点。“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总不好因手指被“刺”，而把蔷薇全部拔掉吧。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

（选自《沸羹信》）

斥反动文艺

郭沫若

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所谓反动文艺，就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和提倡。大别的说，是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封建性的，另一种是买办性的。今天的反动势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集封建与买办之大成，他们是全面武装，武装到了牙齿了。文艺是宣传的利器，在这一方面不用说也早已全面动员“戡乱”了，因此，在反动文艺这个大网篮里面，倒真真是五花八门，红黄蓝白黑，色色俱全的。

什么是红？我在这儿只想说桃红色的红。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及某些“作家”自鸣得意的新式《金瓶梅》。尽管他们有着怎样的借口，说屈原的离骚咏美人香草，索罗门的雅歌也作女体

的颂扬，但他们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正加紧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里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说什么这是“民族自杀悲剧”；把我国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这些话见所作《一种新希望》，登在去年十月二十一日日的《益世报》。）这位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你看他的抱负多大，他不是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吗？

什么是黄？就是一般所说的黄色文艺。这是标准的封建类型，色情，神怪，武侠侦探，无所不备，迎合低级趣味，希图横财顺手。在殖民地，特别在敌伪时代，被纵容而利用着，作为麻痹人民意识的工具。在黄色作家群中，多是道义观念贫弱的究文人，性格破产者，只要靠一枝毛锥可以糊口，倒不必一定有祸国殃民的明确意识。但作品倾向是包含毒素的东西，一被纵容使家黄河决口，泛滥于全中国，为害之烈，等于鸦片。正因为这是一种有效的麻醉剂，足以消磨斗志，甚至毁灭人性，在今天集反动之大成的“当局”（指的是蒋匪王朝的统治者群——编者注）当然也就更从而加紧利用。利用的方法很多，或用金钱津贴，纵容放任，暗中加以保护，这是无形的利用。还有有形的利用，便是使他们的意识彻底反动，以反人民为主题，明目张胆的帮助“戡战”，或于黄色的方块报中时时插入一些反人民的言论，以利宣传。这样被利用的结果，这黄色之

祸，也就更加猛烈起来，黄河决口，不是由于自然崩溃，而是出于有心的抉发了。然而黄河本身其罪固不小，我们断难容恕的是这抉发黄河的滔天大罪。

什么是蓝？人们在这一色下边应该想到著名的蓝衣社之蓝，国民党的党旗也是蓝色的。胜利前潘公展在重庆曾经组织过“著作人协会”，胜利后张道藩又组织了“中华全国文艺作家协会”，都是存心和由战时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相对立的。但他们事实上都只有协会而无作家。记得在重庆时蒋宋美龄曾与谢冰心作过一番谈话。蒋宋美龄问“中国国民党为什么没有一位女作家？”谢冰心回问“中国国民党又有那一位男作家？”这是在文艺圈子里面传播得很广的一段插话。但我想：冰心在回问时恐怕疏忽了一点：国民党是可以有一位男作家的，那便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朱光潜教授了。朱监委虽然不是普通意义的“作家”，而是表表堂堂的一名文艺学学者，现今正主编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杂志》。我现在就把他来代表蓝色。

抱歉得很，关于这位教授的著作，在十天以前，我实在一个字也没有读过。为了要写这篇这章，朋友们才替我找了两本《文学杂志》来，我因此得以拜读了他的一篇《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二卷二期）。这俨然是一位教授写的文章，东方说到孔丘，老庄，还有释迦牟尼，西方则从柏拉图，亚理士多德，说到尼采和克罗齐，又是哲学、又是文艺，又是《神曲》，又是“佛典”，一下是嵇康，王羲之，陶潜，杜甫，一下又是但丁、歌德、莎士比亚、斯蒂文生，学通中外，道贯古今，的确是够教授的斤两，也够监察委员的斤两的。然而他说了一些什么呢？他只说了一篇连自己也并未能圆其说的宿命论而已。他说：“人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生来爱看戏底，

另一种是生来爱演戏底”，“这是一件天生注定丝毫不能改动底事”。真是呜呼妙哉了！中国到了今天，还有这样高明，坐享盛名的大学教授！这些都不必管，且看这位大教授自认为属于他所说的那一类型。教授自己说“我们这批袖手旁观的人们”，他当然是属于“看戏底”的类型了。但要留意，这倒并不是谦虚，而是自命为和孔子、老子、庄子、释迦、耶稣柏拉图、亚理士多德、尼采、克罗齐等等大思想家并驾齐驱的。但是，不幸得很，我这个不知道应该属于那一类型的，就亲自“袖手旁观”过我们这位当今大文艺思想家，在重庆浮屠关受军训的时候，对于康泽特别“必恭必敬”地行其军礼。那到底是在“看戏”，还是在“演戏”呢？我在这里还可以更进一步问问：当今国民党当权，为所欲为的宰治着老百姓，是不是党老爷们都是“生来演戏”的，而老百姓们是“生来看戏”的呢？照朱教授的逻辑说来，又能够得出一个答案，便是“是也”！认真说，这就是朱大教授整套“思想”的核心了。他的文艺思想当然也就是从这儿出发的。由他这样的一位思想家所羽翼着的文艺，你看，到底是应该属于正动，还是反动？

什么是白？这是一批无色而其实杂色的货色，有属于封建型的，还有属于买办型的。无色的白，在光学上讲来是诸色的混成，文艺上的无色派事实上是各种颜色都杂在里面的。当然有的是天真的白，但也有的是伪装的白。故在这儿可以有桃红色的沈从文，篮色的朱光潜，黄色的方块报，最后还有我将要说出的黑色的肖乾。别种货色的反动作家，伪装成白色，固然是反动之尤，而无心的天真者流，自以为虽不革命，也不反革命，无党无派，不左不右，而正占乎其中，然而狡猾的反动派在全面动员“戡战”之下对他们却乐得利用。自己伪装为白色固然是利用，让天真者作为花瓶，甚至拉一两“前

进者”来伪装“前进”，是尤其恶劣的作用。在这儿，我到有一个或会被认为十分偏激的见解，“前进者”固不用说，天真者的作家们，在今天最好不要敷衍或顾忌反动势力而写，写了也决不要在反动或伪自由主义报刊上发表。敌人正想利用你的天真，你又何苦让自己去给人家当伪自由主义的幌子呢？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区别出有些无色者之流入于御用是出于因袭旧套，和另一批因循苟合者稍有不同。前者因客观传统的束缚而无力自拔，后者却因主观策励的薄弱而和光同尘。那一批和光同尘者流，说不定还会自诩聪明，所谓“明哲保身”，然而要当心，老兄们已经在“曲线戡乱”了。

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所想举以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这是标准的买办型。自命所代表的是“贵族的芝兰”，其实何尝是芝兰又何尝是贵族！舶来商品中的阿芙蓉，帝国主义者的康伯度而已！摩登得很，真真正正月亮都只有外国的圆。高贵得很，四万万五千万子民都被看成“夜哭的娃娃”。这位“贵旅”钻在集御用之大成的大公报这个大反动堡垒里尽量发散其为幽缈，微妙的毒素，而与各色御用文士如桃红小生，蓝衣监察，黄帮兄弟，白面喽罗互通声息，从枪眼中发出各色各样的乌烟瘴气，一部分人是受他麻醉着了。就和大公报一样，大公报的萧乾也起了这种麻醉读者的作用。对于这种黑色反动文艺，我今天不仅想大声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

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

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

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

今天你的贡烟就是大公报的萧乾！

今天是人民革命势力与反人民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

候。反人民的势力既动员了一切的御用文艺来全面“戡战”，人民的势力当然有权利来斥责一切的御用文艺为反动。但我们也不想不分轻重，不论主从，而给以全面的打击。我们今天主要的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这一批“作家”。他们的文艺政策（伪装白色，利用黄色等包含在内），文艺理论，文艺作品，我们是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的。我们今天要号召读者，和这些人的字绝缘。不读他们的文字，并劝朋友不读。我们今天要号召天真的无色的作者，和这些人们绝缘，不和他们合作，并劝朋友不合作。人们要袖手旁观，就请站远一点，或站在隐蔽的地方，假使站对敌对阵营里去而自以为在袖手旁观，那就请原谅，你就不受正面射击，也要被流弹误伤。有人或许自认为“我是入虎穴而取虎子”，但请当心，你不要已经为虎作伥了。我们也不拒绝人们向善，假使有昨天的敌人，一旦翻然改悟，要为人民服务而参加革命的阵营，我们今天立地可以成为朋友，但假使有今天的朋友而走上相反的道路，明天也可以成为敌人。我们也知道一味消极的打击并不能够消灭所打击的对象。我们要消灭产生这种对象的基础。人民真正作主的一天，一切反人民的现象也就自行消灭了。我们同时也要积极的创造来代替我们所消灭的东西。人民文艺取得优胜的一天，反人民文艺也就自行消灭了。凡是决心为人民服务，有正义感的朋友们，都请拿着你们的笔杆来参加这一阵线上的大反攻吧！

附记：

这里转载的郭沫若先生这篇文章，发表在去年三月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面。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御用的所谓“文人”和“文化界”是何等腐朽无耻。

（选自《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

新文艺的使命

——纪念文协五周年——

郭沫若

现代中国是从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的双重衡厄之下挣扎起来，争求着她的独立生存，自由平等的。这努力已经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了。作为中国呼声的新文艺，因而在其发轫上，也就是以反帝反封建的姿态而出现。滥觞期应该溯之于前清末年，虽然当时的先驱者们在其意识上并不十分明确。经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随着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旗帜的明朗化，新文艺运动乃至整个的文化运动，获得了划时期的胜利，便由叛逆的地位升到了支配的地位。然而随着这新的胜利的到来，却又有新的斗争接踵而至。纯粹的旧封建势力虽然在表面上隐居了，仅仅维系着它那惰性的元老般的存在，然而却有一大部分的幽灵，借尸还魂，不仅穿上了长袍马褂，而且还穿上了西装。它们靠着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默契，因而更兼带着第五纵队的任务。于是新旧文白之争一变而为意识形态之争，其斗争的激烈较之第一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九一八”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暴露了狰狞的侵略面孔，民族危机日紧一日，因而国内的一切势力便逐渐缓和了内部的斗争，而一致地集中到了抗日的旗帜之下。在“七七”的前夜，文艺界有左翼作家联盟的解消，为全国作家大团结准备下了顺利进行的路径。很明显的，这是反帝的号召又恢复了它的全面支持。在反帝斗争中统摄了反封建斗争。由于侵略战争的

残忍破坏性，由于民族危机超过了社会属性的自觉，封建残余势力也解除了本身上的部分桎梏，而获得了意识上的一步前进，于是中国的文艺界在抗战的洪波中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抗战以来在中国文艺界最值得纪念的事，便是“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结成。一切从事于文笔艺术工作看，无论是诗人、戏剧家、小说家、批评家、文艺史学家、各种艺术部门的作家与从业员，乃至大多数的新闻记者、杂志编辑、教育家、宗教家等等，不分派别，不分阶层，不分新旧，都一致地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而奔走，而呼号，而报效。这是文艺作家们的大团结，这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无疑地是一个空前的现象。继这“文艺界抗敌协会”而起的有戏剧界、音乐界、电影界、美艺界等全国性质的姊妹协会出现，蓬蓬勃勃，风起云涌，形成了文艺行列的大进军，作家团结的豪华版。但这个高潮时代可惜只局限于武汉作战的短暂期间，其后几经迂回曲折，有些组织已在无形中匿迹消声了，而最先产生的“文艺界抗敌协会”，却能迎接它的第五周年成为文艺界继续团结的旗帜，这怎么也是值得令人加倍庆贺的事。

然而无论组织的存继如何，中国的作家们是前进了。由于抗战的驱策促进了作家的团结，也促进了全国的团结；由于抗战的驱策更改进了作家的生活方式而觉悟到自己所担负的使命。抗战以前作家生活固有种种的不同，但不少人是超现实的，远远地和中国的社会脱离，和中国的人民大众脱离。旧式的文人株守传统的贵族生活可不用说，新式的意识模糊的文人则大都陶醉于欧美式的生活方式而成为民族新贵。这理由很简单。中国任何派别的作家都是出身于小有产者，而历史尚短的新文艺是产生于少数近代化了的都市，文艺家脱离都市便会失

掉他的生活根据，甚至文艺脱离都市也会失掉它的存在。例如重要的印刷条件，一般的说在抗战以前便未能离开少数都市而独立。文艺作家要“到民间去”，要“到农村中去”，尽管在前是怎样的呼号，而受着种种客观条件的拘束，始终未能够办到。然而抗战以来却一举而实现了。随着北平和天津、上海和南京乃至广州和武汉的相继沦陷，作家们自动地或被动地散布到了四方，近代都市的文化设备也多向后方移动，后方的若干据点便迅速地受了近代化的洗礼，印刷技巧的普及是惊人的事。大后方的城市如重庆、桂林、成都、昆明……等地，都很迅速地蹶蹶乎达到抗战前某些大城市的水准。这文艺工作者的四布和后方市镇的近代化，便促进了文艺活动的飞跃的发展。战前集中于少数都市的作家们，现在大批地分散到了民间，到了各战区的军营，到了大后方的产业界，到了正待垦辟的边疆，文艺生活和大众生活渐渐打成了一片，作家由生活中得到资源，大众由文艺中得到提炼，这种潜滋默长的交互作用，虽然并不怎么显著，但确是新文艺中的一条主流。

自然，在这种洪涛激浪的澎湃当中总也不免有些不微弱的逆流的声息。起先我们是听见“与抗战无关”的主张，继后又听见“反对作家从政”的高论，再后则是“文艺的贫困”的呼声——叫嚣着自抗战以来只有些田间式的诗歌与文明戏式的话剧。这种种声息，无论出于有意识或者无意识，都以说教的姿态出现，而且发出这些声息的人又都是不屑和大众生活打成一片的人。民族以经膺受着空前的浩劫，而一二文学教员们都高喊“与抗战无关”，究竟是何用意；真正令人难解。这声音怕终竟是因为犯了违背国策的危险吧，早已低弱下去了，然而也并未消失，或则一改调门变而为“要直接与抗战有关”，或者缩小范围变而为“反对作家从政”。